

陈映真终于走了。说他终于走，是他一直为病魔所困，听说十年前已脑中中风，处于迷茫状态。

十年来，一直呆在北京的医院。十年间，包括我和许多朋友想去探望他，都被他太太丽娜婉谢了。

他没有抵抗力，她怕他感染细菌，她在病榻旁相伴了三千六百五十个日子。

听北京的文友说，后期他几近植物人。不管怎样，兀自惦念着他。

对他的感受是太强烈了。这种感觉，还不光因为1983年与他一起参加IWP——美国爱荷华写作计划，相处了三个月。三个月之后，去台湾探望他和他来香港找我，已不光是“同学”，还是好朋友了。

他魁伟的形象、开朗的笑声，和对理想的矢志追求，已镌刻在脑海。

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

我相信，当我们在美国中西部小城爱荷华相遇时，他肯定对我感到失望。我是一家爱国香港书店的编辑部主管，理应像他一样，兼具饱满热情和强烈民族感。

相对他来说，我更像当年的香港人，患上政治冷感病，即使不至于此，起码也是不冷不

怀念陈映真

(香港) 彦 火

热的温和派，与他的慷慨激昂、挥斥方遒的言行，是何等天壤之别。

我说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是因为只要他认定是对的，就会奋不顾身，颇有一往无前的气概！

譬如上世纪八十年代，他的出版社出版一整套某位作家的文集，明眼人都知道，这套书在台湾地区肯定销不了，因为读者无法读懂作品所涉及的人事。结果因出版这套书，他亏了大本，可他并没有挫败感和后悔。

当时，我所在的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他见猎心喜，硬是要我转授版权给他。我相信，这本书在台湾也销不了许多。

不管怎样，他具有的好学和与时俱进的精神，一直感染着我。

我于1984年和1985年在美国纽约大学攻读出版管理和杂志学期间，他写来了一封长信，开了一长串书单，要求我为他搜集一批

出版管理的书籍，包括怎样做出版计划、出版市场调查、出版管理、行销管理及装帧设计等等。

一把年纪，还那么好学不倦，委实教人动容，我利用课余时间，跑了好几家书店为他购这批书寄去。

在信中，他还谆谆叮嘱我“一定要努力用功”，现在想起，不无汗颜，相对他来说，我真是疏懒得很！

他的一生，从来没放弃对理想的追求。美国作家丹纳·海恩斯(Dana Haynes)说：“一个人提到理想，必然充满感情；他会想到流露真情的那种缥缈美丽的梦境。”

陈映真长怀美妙愿景，而且一直憧憬着，所以他能焕发出极大热情和魅力。

1983年11月，临离开爱荷华，他特地为我写上以下一段话：

为了中国文学创作品赏的丰富、提高和纵深，让我们谦卑而坚定地做出我们应做的贡献！……

说是“共勉”，更多的是对我的敦促。

安息吧，映真！时光荏苒，当年的小潘(他给我的信，都以“小潘”称谓)已幡然变成今年逾花甲的老潘，但是，我答应您，我会努力的！

我的文字源于平凡生活，生活状态决定了文字风格。我在纽约生活二十多年，从留学生到公务员，经历了许多细腻微妙具体过程，就像一枚泡在酒里的虎骨，当我把荷尔蒙释出时，也秘密品味着酒精的分量。这是个互换过程，你不扑上身家性命，就很难得到关于此地的确切感受，仿佛不失恋，就无法了解女人一样。当其他作者把美国当作身外之物描写时，我则像记日记一样写自己的生活，编织生命的足迹，这无需振聋发聩，不必冷静思考，跟着感觉走，抒发我的世俗情怀，正像那枚虎骨，向你讲述着烧酒的纯度。

海外写作有感

(美) 陈 九

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名漂泊者的角度才是我写作的独特之处。我认为，真正的漂泊必须时间足够长，在漫长的无助中，走回头路的冲动已消磨殆尽，无论遇到何种困难都得独自面对。这种状态才会让你把悬空的轻佻放下，踏踏实实关注身边的人和事，不是走马观花，是命运攸关的关注，再怎样细腻都不过分。小时候我在外婆家住过两年，老想着回到母亲身边，老觉得不属于这里，当离开外婆家时才发现，我对老人的情感，街坊四邻的状态，几乎毫无所知，没有切肤之痛的感受是漫不经心的，容易飞白。

但是，光有这种状态也不够，还得有浓厚的原乡情怀，虽然无法走回头路，但心底对原乡的情感深刻且不可更改，这种情感恰因身处异乡无法伸展，而被浓缩成某种条件反射：你说美食，我想饺子；你说女人，我想贤惠；你说喝酒，我想高粱；你说吃肉，我想红烧；你说中国穷，我想流泪；你说中国坏，我想抽你，几乎是生理反应。这样一来你就不是你了，而是具有了某种第三者性质。虽命在他乡，却拥有原乡的灵魂。这种落差赋予你独立的审美，让你通过文化孤独，用冷静和批判的目光，对两种文化进行观察比较，即以第三者的立场，向原乡展示异乡的社会生活，并借助这种展示，关注原乡文化的长短曲直，而不只是抒发轻慢的文化感慨。

于是，我选择了休闲式的文字风格，不是刻意远足，而是散步，走哪算哪，边走边聊。不是拍摄有头有尾的纪录片，而像一位当地的摄影爱好者，用文字拍摄随机的生活镜头，不必彼此相连，却又息息相关，构成一幅美国的百态画卷。我并不要倾诉什么，漂泊的恭卑让我变得内向，而想听音乐看画展，带你一起感受异乡生活。没错，是感受，当你不清文字的具体内容，却仍被挥之不去的感觉浸润着，我就满足了。

说芋头

任溶溶

我喜欢吃芋头(广州话叫wutau)，芋头一大个，像槟榔，故称槟榔芋。又出自广西荔浦，亦称荔浦芋。

广东人吃扣肉，喜欢用粉葛片夹扣肉吃，故称葛扣。可我爱吃芋头扣肉，芋头香糯，夹扣肉吃，真好。芋头蒸鸭也呱呱叫。芋头做的菜很多，不胜枚举。

芋头做的点心也非常出名，例如芋角、芋头糕、萝卜糕、马蹄糕，上茶楼必有这三糕。芋头糕蒸煎都好吃。

上海说的芋艿，我们广东人叫芋仔。那不是芋头。

地想，要是教育家能介绍我，是不是没有文凭也能进大学，我冒失地去找陶先生咨询。他住在现在的妇女用品商店楼上，正在吃饭，面前只有一碟萝卜干。我向他深深鞠了个躬，并报上了自己的名字，他开口问：“有什么事啊？”我开门见山地说，

那时的风景(铜版) 夏玉清

一生中的三次机遇

孙毅

从事儿童创作，从事敌后斗争。

1948年，为迎接上海解放集结进步力量，剧团团结了各地来访的儿童剧艺术家，成立了“上海儿童戏剧联谊会”。而我也在当年出版了我的第一本反映流浪儿苦难生活的三幕儿童剧《小霸王》，在上海少年村及淮海中学公演了。

1949年上海解放了，党组织分配我到团工委少年儿童部工作。第二个机遇是，1946年见到了中国福利会主席宋庆龄。她在上海筹建儿童剧团时，讲了建立儿童剧团的宏观理念，说：“希望中国有个专门为儿童演戏的剧团，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通过戏剧培养下一代，提高他们的素质，给予他们娱乐，点燃他们的想象力，是最有教育意义的事……”

此后，我由剧作家包蕾同志联系，指导我继续

们一起到学校、下工厂演出活报剧、朗诵诗歌，宣传抗日。

1949年，上海形势紧张，军警特务横行，在白色恐怖下，上街游行示威被迫减少了。

一天，仲夏对我说，中国少年剧团演出童话剧《胡子与小骆驼》遇到了问题，演骆驼的演员病了，他希望能顶替他演出，并要求我写份自传，介绍一下自己的履历。我当时很激动，向他提出了要求入党的申请，他立即点头表示赞成。提交申请没几天，他和上级党王鼎成同志一起主持了我的入党宣誓仪式。在仲夏同志的引领下，我走上了革命大道……

那次看电影匆忙，对大光明的印象基本忘了，只记得里面有喷泉以及在开映前要敲三下钟。以后随着工作、长驻外地、电视普及、各种文化娱乐形式的兴起带给电影的冲击等原因，竟然再也没去过大光明。

眼下，这座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的杰作，经过重修恢复原貌后又展现在喜爱它的观众面前，能不感慨万千？那晚我领着妻子提前一小时就到了。当我沿着两旁的楼梯上下时，感慨万千：喷泉的水还像多年前那样流淌，让人不忍离去；大观众厅1365张座位蔚为壮观，不管坐哪个角度都不会感觉是偏位；那三个镶嵌喷涂的墙壁富丽堂皇；而浅灰绿的吊顶在灯光的照射下层次分明、光影绚丽；新添的5个小厅精致小巧，如珍珠般点缀其旁！哦，置身于三楼的空中花园，闻二楼咖啡馆飘出的缕缕香味，然后观摩底楼的“影院历史文化长廊”，不得不感叹，在欣赏电影艺术魅力的同时，也能感知大光明的建筑——这凝固的音符之魅力！

作为上海精神与文化曾经的符号，“大光明”和凋落的岁月一起，被印在一张叫作往事的底片上慢慢变黄，成了心中的记忆！优秀的建筑会用独特的美在我们心底留一脉长长的余香！

十日谈

我和优秀历史建筑

拍摄组进张园，请看日本栏。

申城冬日三章

秦史秩

崇明东滩

晴短纷纷效旅鸿，
幸无网罟置滩东。
明春若见黑琵鹭，
便是穿烟渡晚戎。

街树冬青

冬雨霏霏惊夜梦，
瓦间瑟瑟舞寒风。
几间不解冬青意，
此物此时顶上红。

信步北外滩

黄歇浦西步道通，
长滩景色气如虹。
寻常旧物出新意，
毕竟沧桑百岁终。



2008年大光明电影院开始整修，一年后重新营业。那次放映影片《高考1977》，院方首次搞了一个活动就是不映前售票，而是看完电影后观众根据自己的喜欢程度往箱子里投钱。领票当日我特地前往，欲再次领略其辉煌又多舛、浪漫又典雅的风采。

远远看见大光明那熟悉的轮廓，倍感亲切。仰头望，矗立着30多米高玻璃柱的大光明，依然是那样摩登、光彩照人。这就是曾经的“远东第一影院”吗？这就是30多年前曾光顾过我心中的殿堂吗？我抚摸这座拥有80年历史的建筑，犹如与久别的朋友握手，此时相逢，无限感慨涌上心头。

记得第一次跨进大光明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那次我一个在安徽部队当营级干部的堂哥来沪出差，我和他及其警卫三人一起游览南京路。逛到大光明电影院时，堂哥说，我们看场电影吧？“好呀！”我欣喜若狂！因为我这个土生土长在下只角的上海人还没进大光明看过电影呢！今天这机会真是太好了，一来陪堂哥，二来可一睹这一流影院的风采！

然而，那年月文化生活与物质生活一样匮乏，电影院从早到晚总是人头攒动，等退票和换票的始终把门口堵得水泄不通。还好，“革命军人每人可凭证购一张当场票”，最后是警卫员忍痛割爱换来了我和堂哥看了这场首轮放映的彩色遮幅式故事片《熊迹》

重进『大光明』

……

那次看电影匆忙，对大光明的印象基本忘了，只记得里面有喷泉以及在开映前要敲三下钟。以后随着工作、长驻外地、电视普及、各种文化娱乐形式的兴起带给电影的冲击等原因，竟然再也没去过大光明。

眼下，这座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的杰作，经过重修恢复原貌后又展现在喜爱它的观众面前，能不感慨万千？那晚我领着妻子提前一小时就到了。当我沿着两旁的楼梯上下时，感慨万千：喷泉的水还像多年前那样流淌，让人不忍离去；大观众厅1365张座位蔚为壮观，不管坐哪个角度都不会感觉是偏位；那三个镶嵌喷涂的墙壁富丽堂皇；而浅灰绿的吊顶在灯光的照射下层次分明、光影绚丽；新添的5个小厅精致小巧，如珍珠般点缀其旁！哦，置身于三楼的空中花园，闻二楼咖啡馆飘出的缕缕香味，然后观摩底楼的“影院历史文化长廊”，不得不感叹，在欣赏电影艺术魅力的同时，也能感知大光明的建筑——这凝固的音符之魅力！

作为上海精神与文化曾经的符号，“大光明”和凋落的岁月一起，被印在一张叫作往事的底片上慢慢变黄，成了心中的记忆！优秀的建筑会用独特的美在我们心底留一脉长长的余香！

十日谈

我和优秀历史建筑

拍摄组进张园，请看日本栏。

